

导论 变动中的地区产业竞争力

经济发展具有空间不平衡性，地区间的产业竞争乃经济史上最基本的现象之一。从宏观角度看，这种竞争体现为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从微观角度看，竞争主体实为单个之企业。国家作为企业发展所无法忽视的背景固毋庸赘言^①，但一国之内，企业又植根于特定地区，该地区遂构成企业发展所依托的具体的空间背景。同一产业在一国内部不同地区具有相异的发展可能性，而不同地区之间也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导致资本的流动与产业的兴衰^②。因此，国家内部的“地区”实为研究产业发展不可避免的分析单位。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洲级大国，某一省区在规模上往往可以匹敌某个国家，分区研究更显必要。本书拟以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为个案，考察该地区这一主要产业的长期演化态势，从历史的角度剖析影响地区产业竞争力的诸要素。

一、产业竞争优势的历史审视

在经济思想史上，对产业竞争力问题的探讨可以溯源至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时代。目前，绝大部分讨论产业经济的著述，都会对相关理论加以铺叙。概括地说，相关研究存在着一个由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到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理论的模式转移。实际上，竞争优势理论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替代，从本质上说是将静态的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而这一理论上的动态化，突显了时间与演化的重要性，进而也就突显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从历史角度审视产业竞争优势，无论是基于资源的比较优势，抑或是人为构筑的竞争优势，都相当重要，关键则

^①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李明轩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② Laurence F. Gross: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Decline: The Boott Cotton Mills of Lowell, Massachusetts, 1835-1955*,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40.

在于产业持续进化的能力。

（一）作为正统的比较优势论

比较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原则，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据着正统理论的地位。比较优势理论最初被用于解释国际贸易，即如果各国专门生产和出口其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就会从贸易中获益^①。换言之，各国应该利用其固有资源禀赋展开自由贸易，以增进彼此福利。恰如该理论创始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所言：“如果一位制造商用等量资本在煤炭丰富的地方比煤炭稀少的地方生产更多的铁，那么国家就会从这笔差额中受益。如果任何地方都没有丰富的煤炭，如果他进口铁，并用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一种商品换取这种增加量，他便以同样的方式用铁的这种增加量使其国家受益。”^②由此可见，比较优势理论虽主要是为了解释国际贸易，但由于贸易的基础是商品生产，该理论也是一种产业发展理论。进一步说，由于比较优势理论强调资源对于产业发展的主导作用，该理论不仅可用来分析国家，更可用以分析小范围的地区。

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比较优势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③。实际上，尽管比较优势理论是李嘉图创造的，但其思想内核却师承亚当·斯密（Adam Smith），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the natural course of things）。在斯密看来，自由市场（free market）这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在引导个人无意识地追求自身利益时，可以促进社会公益，其效果远胜于他有意为之，由此推论，一个国家在能够进口更便宜的外国商品时却自行制造是愚蠢的^④。斯密的这一观点与比较优势原则的政策推论是一致的。故李嘉图亦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体制下，各国都必然地将其资本和劳动用于对本国最有利的方面”^⑤。在当代经济学界，斯密理论的传人，如杨小凯，明确指出：“经济

①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1 页。

②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5—226 页。

③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6 页。

④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Bantam Dell, 2003, pp. 572-573.

⑤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4 页。

发展的根本在于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无谓的干预。”^① 这一“市场的力量”，若细究起来，其实质即在于比较优势原则对产业演化的引导。而在将比较优势原则提升至“战略”高度的学者看来，该原则的要点在于“资源的约束”^②。

尽管比较优势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占据正统地位，但自其诞生以来，即饱受诟病，而在对比较优势论的长期批判中，竞争优势论逐渐兴起。

（二）对比较优势论的反思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见解，经济学理论是为特定的利益群体服务的，这一观点证诸比较优势论尤为明显。在李嘉图的时代，英国是全球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展开自由贸易（free trade），英国的工业制成品能保持对其他国家的优势，赚取更大的附加价值，并诱导其他国家成为英国工业的产品市场及原料产地。这种前景令美国、德国等国的一批精英感到忧虑，遂从政策上采取提高关税等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措施，从理论上构造出反对比较优势论的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y）保护论。幼稚产业保护论的代表性人物为德国人李斯特（F. List）。李斯特对于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正统经济学持强烈批判态度，他主张落后国家如德国应致力于工业化。李斯特认为，国家“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用保护制度”，而这种制度首要的任务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市场排除出去”^③。与李嘉图对固有资源禀赋的强调不同，李斯特更注重人为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写道：“不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而增进或减退；但是个人的勤奋与俭约、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④ 李斯特

①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4 页。

② 林毅夫，蔡昉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38 页。

③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17 页。

④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98 页。

的论点实际上已经蕴含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要素了^①。

从理论的角度看，比较优势论比幼稚产业保护论具有更严密的逻辑，更加抽象，并且更能适应数学推导。因此，在正统经济学体系中，比较优势论构成学科的理论基础，而幼稚产业保护论或保护主义迄今并不被一些经济学者所承认。然而，在实践中，那些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落后国家往往取得更大的发展，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国家却常常沦为殖民地或依附国^②。例如，尽管非洲国家“遵循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其工业化却并不成功^③。这一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局面，说明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缺陷。反之，保护主义学说虽然不严密，却有其合理内核。其实，尽管学者一般将李斯特作为斯密和李嘉图的对立面，但李斯特与二者具有相通之处。首先，对于正统经济学鼓吹的自由贸易，李斯特并未从根本上表示反对，他只是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无法实现要素配置的最优化。相反，如果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而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则自由贸易是可行的。换言之，李斯特的学说是一种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的经济学^④。其次，看似水火不容的李斯特与李嘉图亦有统一的一面。如速水佑次郎所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是一个静态的理论，而在动态的现实经济中可能会出现令该理论失效的严重的市场失灵，故李斯特将之扩展为一个“可应用于以生产成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特征的长期发展过程的动态理论”^⑤。因此，尽管当代研究产业竞争力的学者对保护主义仍莫衷一是，但多与李斯特一样，将比较优势视为动态可变的，从而提出竞争优势的概念。其最具代表者如迈克尔·波特，批评比较

① 关于两者之关联的详尽分析，参见：埃里克·赖纳特：《竞争力及其思想先驱：五百年跨国比较的视角》，埃里克·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135页。

② 可参考：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英美富强之道考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③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④ 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⑤ 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

优势论为“全然静态的概念”，他自己的竞争优势理论则以“动态与不断进化的竞争”为前提^①。波特的理论认为某个地区的产业欲取得竞争优势，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而这两种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②。换言之，经典比较优势理论重视的是地区原有的资源禀赋，竞争优势理论则认为资源禀赋是可以通过人为努力创造的。要之，比较优势不是自然的与绝对的，而是人为的与相对的。这种观点就给产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因此，对某个地区的产业来说，其竞争力并非简单由地理资源所决定，而包含着人为努力的可能性。这种人为努力可以打破资源的约束，从长远来看，对产业发展而言是更加根本的。同时，一旦将静态的比较优势视为动态的竞争优势，则时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研究而言，这就意味着长时期的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历史角度审视产业竞争力问题，关键或在于产业是否具有持续进化的能力。

（三）产业持续进化能力

产业持续进化能力，可以指产业在长期演化的过程中，面对变动中的市场环境 with 政治环境，发展出的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企业“学习能力”这一概念，在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中并非新论。所谓演化经济学，是一种广泛使用生物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隐喻的经济学^③。此处借用演化经济学的理念，意在表明，产业的竞争力在本质上就是其成功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特定地区的某个产业如同特定生态环境下的某一物种，与其生存的环境逐渐建立起了协同互动的关系，构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但是，在大自然中，新物种的闯入或气候的变动都会改变原有的生态体系，甚至使原有物种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对产业而言，市场上的新进入者或宏观环境的变化，也会发起相同的挑战。与必须成功进化以适应新环境的物种相一致，产业要生存，也不得不学会应对新形势。故此，在由

①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李明轩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 页。

②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上），李明轩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2—73 页。

③ 杨虎涛：《演化经济学讲义——方法论与思想史》，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3—52 页。

市场和政治构成的大环境中，产业必须保持持续进化的能力。而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看产业持续进化能力，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暗示了外部环境的重要性，而这是将传统比较优势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相统一的一个契机。事实上，尽管竞争优势论正确地指出了人为努力可以重构比较优势，但这也并非绝对的。在很多情况下，人类仍然是自然地理的囚徒。例如，在国际贸易中，沿海口岸比内陆山区更具优势，甚至到人类已经发展出高铁技术的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也是单凭努力很难改变的事实。部分取决于类似的地理因素，部分取决于其他因素，在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活动常集中于有限的地区，从而形成核心-边缘的结构^①。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核心-边缘结构意味着发展的不均衡性，对现代经济来说，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②。因此，就地区间的产业竞争而论，某些地区的产业因享有特殊的地缘优势，可谓赢在了起跑线上。同时，时至今日，一些产业仍依赖自然资源作为原料，这使得原始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仍然有相当大的作用空间。唯其如此，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既意味着天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划定了产业演化的轨道，又意味着产业具有顺应或是改变该轨道的可能性。

其次，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暗示了时间累积对于产业成长有重要意义。尽管产业的应变能力有快有慢，但一般而言，能力的获取存在着一个长期学习与积累的过程，非一日之功。同时，产业能力的发展在时间上是非均质的，各个阶段的外在表现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在某些阶段，产业的进步看上去相当缓慢，在某些阶段，产业则似乎取得了重大突破。然则，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没有那些经年累月的不起眼的积累，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突破。以英国工业革命来说，这场革命的不少基础性技术在此前的欧洲早已存在，只是到了18世纪又进一步改良或重新组合。因此，考察英国工业革命不能只看18世纪的突破而忽略了此前的长期积累。换言之，对产业某些能力的发展来说，长期不间断的持续性积累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其积累过程被中途打断，则突破性变革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历

① 皮埃尔-菲利普·库姆斯，蒂里·迈耶等：《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安虎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② 尼尔·寇等：《当代经济地理学导论》，刘卫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4页。

史对于产业发展相当重要,产业的成功与失败都可能源于某些结构性因素。而且,正因为如此,某些短期内缺乏收益的政策在长期来看会有回报,例如,日本与韩国的汽车工业都历经了漫长的保护阶段,而诺基亚公司(Nokia)在具备竞争力之前长期亏损,接受了17年的补贴^①。当然,从另一方面说,由于产业发展具有时间非均质特性,其演化前景也就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对于某个长期表现平平的产业来说,很难确定它究竟能否达到突破点,或是根本无药可医。这意味着产业演化的行为主体必须具备承担风险的魄力。

最后,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既包含延续,也包含断裂,在本质上是一个熊彼特式竞争的过程。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被认为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其核心理论为“企业家精神”与“创造性毁灭”。熊彼特认为“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形式”^②,因此,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打破日常循环周转的创新精神。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它是促成产业升级的内在驱动力之一,而企业家精神的产生主要源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如前所述,产业演化的时间非均质特性孕育了巨大的风险,而所谓熊彼特式企业家,就是那种敢于承担风险,乃至“逆着潮流游泳”以改变循环周转管道的产业行为主体^③。而只有实现了这种与旧传统的断裂,产业才能创新,并获得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但是,熊彼特式竞争同时意味着“创造性毁灭”,即经济发展“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④,这种创造性破坏若在产业内部发生,将更多地体现为“创造”,若在产业外部发生,则可能会带来摧毁整个产业的“破坏”——例如电灯代替油灯、汽车取代马车等。换言之,熊彼特式竞争既是产业持续进化能力的动力,也可能会毁灭产业持续进化能力。因此,对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熊彼特意义上的经济发展,

①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②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6页。

③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1页。

④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7页。

实不可渲染为玫瑰色，相反，这种发展是一场残酷的竞赛。同时，从经济意义上说，创造性毁灭确实代表了产业的发展，但从社会角度看，创造性毁灭也可能意味着企业破产浪潮后的大规模失业问题^①，而这个潜在的社会问题是任何地区在谋求发展时都必须承担的风险。进一步说，重要的不仅是熊彼特，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同属必要^②。

综上所述，对特定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而言，产业是否具有持续进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从研究的角度说，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的分析框架，来剖析在特定历史阶段影响产业发展的诸因素，并以一个长期跟踪观察的视角加以整合。因此，选择某一个案进行详尽的历史研究，有助于观察创造性毁灭过程的全景，从而更全面地分析产业的演化机制。此处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演化经济学家所谓的“解释型的理论推导”，即“通过密切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细微变化，从而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描述，提出解释”^③。这一方法，将避免纯粹理论推导的过度抽象化与脱离现实，同时使历史研究围绕问题展开，从解释问题的角度将经验材料组织起来。

二、个案选择依据与学术前史

为了更有效地阐释产业持续进化能力这一概念，有必要展开经济史的个案研究。本书选取的个案为1800—2012年间的湖北纺织工业，其研究价值如下所述。

（一）研究湖北纺织工业的意义

纺织工业是和人类日常生活有最密切关联的民生产业之一。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穿衣不仅使人类避寒保暖，而且其遮羞作用具有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功能。因此，纺织工业是最古老的产业之一，并与当前的人类

① 对该问题的详尽研究，可参考：威廉·拉让尼克：《创新魔咒：新经济能否带来持续繁荣》，黄一义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卡尔·波兰尼从大萧条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自我调节的市场包含着毁灭社会的危险，并能激发包括法西斯主义在内的社会自我保护措施。因此，有必要“发现社会”，以遏制自由市场的自毁性倾向。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页。

③ 理查德·尼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汤光华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文明共生。研究纺织工业,有可能从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观察产业的演化,符合考察产业持续进化能力所需要的条件。当然,更重要的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纺织工业就一直属于很多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主导产业之一,具有理论分析的价值。此外,纺织工业和服装业不仅是最早实现全球化的制造业,而且,直到今天,该产业仍然是发达国家重要的就业来源,在老牌工业化国家中保有相当地位,并因此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源头之一^①。综上,纺织工业是一个具有现实价值的产业史研究样本^②。

中国的工业化发端于清末洋务官僚创办的军事工业,但是在1949年之前,棉纺织工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主导产业。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最初确立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将资源倾斜至机械、钢铁等战略性产业,但纺织工业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中央政策一度转向消费品工业优先,纺织工业再度成为主力产业之一,并构成中国大陆外向型经济战略的产业基础。进入21世纪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重化工业化再度推进,纺织工业的地位有所降低,但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产业在吸纳就业的作用方面仍然举足轻重。据统计,2011年中国纺织业规模以上企业共22945个,总产值32652.99亿元,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588.83万人。同年,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为11750个,总产值13538.12亿元,从业人数年平均382.41万人^③。不计具有重化工业特征的化学纤维制造业,2011年中国纺织工业主干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有34695个,总产值46191.11亿元,年平均从业人数达971.24万人。当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325609个,总产值844268.79亿元,全

① 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刘卫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9页。

② 作为最早的主导产业之一,纺织业在当今世界也是工业衰退(industrial decline)的典型产业,尤其见之于工业先行国家。因此,研究纺织业的演化史,不仅可以分析工业化问题,还可以分析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问题。相关研究可见:Mary B. Rose: *Firms, Networks and Business Values: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Cotton Industries since 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Timothy Minchin: *Empty Mills: The Fight Against Import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 S. Textile Industry*, Plymouth: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3。

③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6页。

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9167.29 万人^①。是则整个纺织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10.7%，总产值占 5.5%，吸纳就业人数占 10.6%。由此可见，尽管纺织工业的产值较低，但对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贡献是巨大的。进一步说，以上数据仅为规模以上企业的状况，按其统计标准，即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而未进入统计范围的规模以下纺织类企业，亦同样起着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拥有巨量人口的后发展大国，其工业化进程注定是多方面不平衡的，即使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纺织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吸纳就业、维持社会稳定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就此而言，对中国纺织工业的研究意义重大。

在中国各地区中，湖北省的纺织工业又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早在明代，由于在植棉、种麻等方面具有自然地理上的比较优势，湖北的传统棉、麻纺织业已颇为发达。晚清开埠通商以后，尽管湖北的传统纺织工业受到进口洋货的冲击，但新的生产方式也由此引进。尤为重要的是，张之洞督鄂时期，在武汉地区创办了现代纺织工厂，使湖北在纺织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得全国风气之先。受此影响，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湖北的棉纺织工业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产生了裕大华集团这样颇具竞争力的企业。因此，湖北的纺织工业实际上可视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一个缩影。抗战爆发后，受日寇摧残和企业内迁的影响，湖北纺织工业一度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北的纺织工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在布局上改变了几乎完全集中于武汉的格局。在棉纺织工业方面，湖北延续了其传统的优势地位。然而，由于技术力量不足，以及资源投入有限，在化纤等纺织工业前沿领域，湖北的发展较为迟滞，这也直接导致今日湖北纺织工业存在着化纤等方面的弱点。改革开放以后，在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冲击下，缺乏地缘优势的湖北纺织工业受到较大打击，其竞争力落后于沿海省份，逐步丧失了传统上的优势地位。与此过程相伴随的，则是企业改制转型的阵痛。因此，湖北纺织工业的演化对于探讨外向型经济战略主导下内地产业的发展颇具典型性，也提供了足够的样本用于分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产业的发展问题。今天，尽管湖北纺

^① 国家统计局工业统计司编：《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 页。

织工业与过去相比已显衰微，但该产业仍然是一个地区性的重要产业。据统计，2011年，湖北规模以上纺织工业企业（含纺织业及纺织服装与服饰业）数量为1255个，工业总产值1840.59亿元，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39.39万人。同年湖北汽车工业从业人数年平均30.90万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19.48万人，农副食品加工业16.30万人，通用及专用设备制造业15.58万人，计算机及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12.32万人^①。纺织工业在湖北各类工业中对劳动力的吸纳高居榜首，对于该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换句话说，纺织工业在湖北并未成为一个已死或将死的产业，它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对这样一种仍在活跃的产业的研究，也就具有由历史衍生出来的现实意义。

不过，与湖北纺织工业重要性不相称的是，对该产业进行研究的著述还很少见，这与学者对上海等地区纺织工业发展史的关注形成鲜明对比。以上海来说，该市棉纺织工业在一般性产业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更有若干专著对其进行深描，使上海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史能够得到全景式的呈现^②。但是，对中国而言，湖北这样的内陆省份比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更能体现这个国家的后发展特征。就此而论，加强对湖北纺织工业发展史的研究很有必要。

（二）学术前史述评

早在1920年代，学者即对中国的纺织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展开了研究，其中也涉及湖北的纺织业。在1949年之前，中国纺织业研究成果最重要者为方显廷的《中国之棉纺织业》，以及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③。在今天看来，方显廷与严中平的著作不仅为研究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其部分结论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例如，方显廷在1930年代预测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时，写道：“故欲求中国纺织业之发

① 湖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编：《湖北统计年鉴2012》，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第282—313页。

② 代表性著作如：王菊：《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金志焕：《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研究（1945—1950）》，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苏文：《高郎桥纪事：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1700—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③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展，首要之务，在于永弭内战，消除政治的阻力，然后其他的经济的原因，如资本缺乏，管理不良，及劳工效率低微等，自易解决。”^①方显廷的这一预测，在1949年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另外，无论是严中平还是方显廷，其重视历史的方法论均值得借鉴。

除上述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外，在研究中国纺织工业的专著方面，赵冈、森时彦、久保亨等学者皆有杰出的成果^②。此外，具有官修史书性质的《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近代纺织史》等书亦已编撰出版^③。近年来，亦不乏学者从竞争力和产业转移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问题^④。限于篇幅及主旨，本书对此类综合性研究成果不一一胪列。然而，上述部分成果的若干结论对于本书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例如，森时彦的著作以中外资本在中国棉制品市场上的竞争为主轴展开，揭示了近代日本“在华纺”（即中国的日资棉纺织企业）系以纱支的高支化为手段，与中国本土纺织企业展开竞争。也就是说，日本企业利用其技术优势，依靠提升产品质量，占据了高附加价值的市场，同时挤压了华商企业的生存空间^⑤。与之相应的是，在193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以上海日商纱厂——上海英商纱厂、上海华商纱厂及青岛日商纱厂——地方华商纱厂为序列的雁阵^⑥。毫无疑问，作为地方华商纱厂的湖北纺织企业在这个雁阵中是位居最底层的。实际上，就整个东亚纺织工业来看，从19世纪末到今天，以雁阵形态为特征的地域分工一直存在，故森时彦的结论具有极强的

①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95页。

② 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袁广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久保亨：《戦間期中国の綿業と企業経営》，汲古书院2005年版。

③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纺织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该书编委会：《中国近代纺织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

④ 代表性著作如：杜晓燕：《中韩纺织业竞争力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吴迎新：《区域纺织业发展实证研究——基于集聚、规模与效率》，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李廷等：《全球产业网络重构中的中国纺织产业转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⑤ 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82页。

⑥ 森时彦：《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的动态结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日本东方学》第1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5页。

时间延展性。值得一提的是,森时彦专门研究了沙市棉业与四川市场的关系,认为机纱的导入使四川本地生产的新土布能够开始驱逐此前雄踞川省市场的湖北旧土布^①。在目前的学术成果中,对湖北棉纺织业进行如此深入剖析的论著尚极少见。再如,杜晓燕通过对中韩两国纺织业进行比较,指出纺织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来源于企业资源、战略和组织结构等内部因素,政府对产业的直接支持并不能提高产业竞争力。同时,她指出同业间的过度竞争对产业竞争力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②。这些结论虽然未必绝对正确,但对于纺织工业这一充分竞争行业来说,政府的某种协调与干预显然有其必要,故杜晓燕在理论上将政府视为产业竞争力的内生变量很有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史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中,很多学者注意到该产业发展初期存在着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互补的现象。彭南生将其称之为“二元工业化”,即后发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条“移植”与“嫁接”并举、传统工业与近代工业互补发展、城市与农村同时出现工业化现象的二元道路^③。徐新吾、张忠民、史建云、林刚、戴鞍钢、马俊亚等学者亦皆注意到相关现象,并以棉纺织业为例展开了研究^④。近来,彭南生又提出“半工业化”这一概念,对中国二元工业化道路的农村工业化部分进行了更详尽的分析^⑤。顾琳(Linda Grove)则以河北高阳的乡村纺织业为个案,对中国的农村工业集群进行了跨度长达一个世纪的考察^⑥。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揭示了一个共性问题,那就是,在一个人口数量

① 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页。

② 杜晓燕:《中韩纺织业竞争力比较》,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183页。

③ 彭南生:《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以近代民族棉纺织业为例》,《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第60—66页。

④ 徐新吾主编:《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第16—24页;史建云:《农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63—71页;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58—62页;马俊亚:《工业化与土布业:江苏近代农家经济结构的地区性演变》,《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98—117页。

⑤ 彭南生:《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7年版。

⑥ 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巨大的农业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以后，并不一定很快会出现新产业彻底打垮旧产业的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相反，传统产业可能会具有极强的韧性，甚至凭借某些新技术自我嬗变为“新式传统产业”。这一现象，不仅中国存在，日本也一样^①。因此，在研究纺织工业这一劳动密集型产业时，有必要考虑到该产业在后发展国家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会非线性地演化出多元形态。这一点对于以促进就业为着眼点的产业政策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在上述所列综合性研究中，或多或少都会包含和湖北纺织工业有关的内容，但是，专门研究湖北纺织工业的论著数量颇为有限。目前最为集中呈现湖北纺织工业发展史的著述有《湖北省纺织工业志》，该志取材原始史料，条分缕析，述议得体，具有较高的修撰水平^②。在此总志之外，尚有一批地区行业志及厂志，一般性的地方通志中对纺织工业亦有所涉及。除志书外，从宏观层面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湖北工业史》。该书纵贯古今，尽管纺织工业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内容，但对产业演化的完整轨迹仍有一个初步的梳理。此外尚有若干整体性的通史著述涉及纺织业^③。这些考察湖北工业化的著作多会涉及张之洞督鄂时期的政策，而冯天瑜、陈钧、任放、李细珠等学者的著作对张之洞在湖北创办新式工业有深入论述^④。在论文方面，冯天瑜与陈锋主编的《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收录了

① 相关研究可参考：中村哲主编：《东亚近代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中村哲主编：《东亚近代经济的历史结构》，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0页；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编：《日本经济史·开港与维新》，李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2页；西川俊作，阿部武司编：《日本经济史·产业化的时代》上，杨宁一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2—175页；杉原薰：《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一个长期视角》，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② 该书编纂委员会：《湖北省纺织工业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徐鹏航主编：《湖北工业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宋亚平等：《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经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之湖北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田子渝，黄华文：《湖北通史·民国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徐凯希、彭敦文等学者颇具分量的文章，从宏观上对近代武汉乃至湖北工业的发展及其遭遇的挫败进行了总结。此外，孙景汉考察了19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对武汉民族工业造成的打击^①。

以上所述主要为对湖北工业史的整体研究，其中或多或少会涉及纺织工业。至于专门以湖北省纺织工业为探讨对象的研究性论著，可分为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两部分。在历史研究中，传统纺织业或乡村纺织业被若干学者所关注。例如，张家炎从作物选择与家庭纺织业生产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江汉平原农民在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及市场扩展情况下的经济行为^②。至于城市现代纺织工业方面，不少学者将视线集中于原始资料已经得到整理与出版的裕大华集团，对该企业的发展历程已有较完整的刻画^③。在海外研究方面，彭涓涓的博士学位论文亦通过剖析裕大华集团这一个案，指出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创办的企业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工业企业在民国时代是处于持续扩张之中的，并未因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1940年代的战争而衰败^④。彭涓涓另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1921—1957年间裕大华集团的社会福利制度，认为该企业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在战时得到了空前的扩张，至1950年代反而减速，因为1950年代初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生产设备更新项目以及阶级调和，工人亦被迫牺牲薪水和福利以支持重工业优先战略^⑤。在当代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点集中于湖北纺织服装业的出口对策，以及品牌建设等问题，短期时效性相当明显，并可

① 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孙景汉：《世界经济大危机与1929—1936年武汉的工业》，见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② 张家炎：《环境、市场与农民选择——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生态关系》，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③ 该资料汇编为该书编辑组：《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相关研究著述颇多，最具代表性者包括：姜铎：《略论旧中国裕大华资本集团》，《江汉论坛》1983年第3期；姚会元：《“裕大华”及其经营管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罗萍：《城乡产业互动与近代内地民族棉纺织企业的发展——以裕大华纺织集团为中心（1919—1937）》，《江汉论坛》2012年第7期，第109—114页。

④ Juanjuan Peng: *Yudahua: The Growth of an Industrial Enterprise in Modern China, 1890-1957*,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08.

⑤ Juanjuan Pe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in the Yudahua Business Group, 1921-1957*,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ume 8, Issue 1, 2013: 104-130.

见外向型经济对于学者选择研究课题的深刻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湖北纺织工业的研究虽已取得较多成果，但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与上海等地区纺织工业研究成果在时段上的完整度相比，湖北纺织工业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尤其体现于历史研究与当代研究的割裂。虽有若干学者打破了1949年的界限，致力于长周期研究，但其研究或关注所有工业门类的发展，或只选取单个企业作为典型，尚缺乏对于特定产业的真正关切。同时，即使在原始档案等资料易于获取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也多喜欢剖析典型企业，而较少分析整个行业的发展。有鉴于此，本书选取湖北纺织工业作为个案进行长时程研究，正是期望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既使产业持续进化能力这一理论得到经验样本的支撑，又使湖北纺织工业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能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呈现。

三、研究旨趣

本书拟按历史时序研究湖北纺织工业的发展，但这并不表明本书是一本面面俱到、巨细靡遗的产业通史，相反，在完整呈现湖北纺织工业演化轨迹的同时，本书更重要的任务是对历史展开分析。这意味着本书侧重于解释因缘，在时序演进的大框架下，只提取那些最重要的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展开论述。例如，纺织工业内部又包含棉纺织、丝绸、针织、麻纺织、化纤等诸多行业，本书的视野将主要集中于对湖北而言最为重要的棉纺织业，旁及化纤、服装业等。诸如丝绸等业，对湖北的意义有限，本书很少涉及。麻纺织业虽然是湖北的优势产业，但该业对天然比较优势的依赖更胜于人为竞争优势，故亦非本书关注重点^①。这样一种研究旨趣，与注重全面描述产业发展情形的行业志不同，毋宁说是一种承袭德国历史学派（German Historical School）的“历史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正是李斯特，而该学派的特色在于不满正统经济学无视国情差异的抽象理论，转而运用历史方法剖析具体问题^②。事实上，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即曾对普鲁士的纺织工业进行过个案研究^③。而德国历

① 相关行业的发展史可参考该书编纂委员会：《湖北省纺织工业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Jacob Jan Krabbe: *Historicism and Organicism in Ec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Though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③ 施穆勒：《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1页。

史学派的学说被普遍认为是令德国这个落后国家在 19 世纪崛起的智力支持之一。这样一种具有后发展特性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实际上也体现了研究者的家国情怀。故中国经济学家赵德馨亦借用该学派之方法论，提出创立“中国经济发展学”之构想^①，而“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成立，实有赖于汇聚单个产业之经验研究。此即为本书之研究旨趣。

^①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17 页。